

香港浸會大學 文學院



中華基督宗教研究中心

通訊

電郵地址 E-mail address : cscs@hkbu.edu.hk

網址 Website : <http://cscs.hkbu.edu.hk>

2002 年 4 月

第二期



中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
九龍 九龍塘
聯福道 34 號
思齊樓七樓 七三一室

香港浸會大學 逸夫校園
中華基督宗教研究中心
電話 : (852)-3411-5370
傳真 : (852)-3411-5151

Centre for Sino-Christian Studies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DLB 731, 7/F., David C. Lam Building
Shaw Campus, 34 Renfrew Road

Kowloon Tong, Kowloon
Hong Kong SAR, China
Tel : (852)-3411-5151
Fax: (852)-3411-5370



記「中華基督宗教研究中心」 開幕典禮

主編 關啟文

中

華基督宗教研究中心〔下面簡稱「中心」〕隸屬於香港浸會大學的文學院，在 2001 年 12 月 19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30 分於香港浸會大學的逸夫行政樓五樓會議廳舉行了開幕典禮，江丕盛教授（香港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教授及中心副主任）擔任典禮的主席。當天與

會的有 80 多人，分別來自中港台的學術機構、神學院、教會機構、文化機構等，可說濟濟一堂。我們很榮幸得到香港浸會大學的吳清輝校長親自蒞臨致辭，他語重心長地指出，在高度強調物質主義、技術掛帥的今天，基督教的教育理想的一個重要角色，就是去提倡精神價值，以平衡社會流行的實用主義、物質主義、和自我主義。他相信中心的成立，在這方面也將作出一定貢獻。（吳校長致辭全文刊登在本通訊第 3 頁。）近期在尋索香港浸會大學的清晰定位的過程中，吳校長提出香港浸會大學應發展成為一間優秀的文理大學，兩方不可偏廢之餘，人文精神的提倡更是重要，這樣看來，中心的成立和香港浸會大學的長遠發展方向可說不謀而合了。

文學院院長黎翠珍教授一直也支持中心的工作，她當天也有言簡意賅的歡迎辭，祝賀中心的成立。另外在同一時期中心舉行了一連三天的學術會議（有關報導在本通訊第 5 頁），有數十位中港台及海外的學者參加，其中兩位就代表這些嘉賓致辭：章開沅教授（前華中師範大學校長，華中師範大學教會大學研究中心主任）；楊慧林教授（人民大學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所長）。兩位都對中心寄以厚望，特別是章校長妙語如珠，會場的氣氛也因此熱烈起來。



接著是介紹中華基督宗教研究中心的時間，香港浸會大學傳播系（數碼圖象專業）的一位同學徐亭是替中心設計標誌的，她當天用 PowerPoint 的方法將她的設計意念很清晰地向與會嘉賓解釋。大家都感到印像深刻，原來小小的一個標誌背後的故事可不簡單呢！（標誌的意義的解釋刊登於本通訊第 4 頁。）可見徐同學的心思，我們在此再謝謝她。此外，當天與會嘉賓一坐下時已發現在他面前放了一個很精緻的紀念品，原來是一個以中心標誌為造型的袖珍講台，上面還有一本袖珍書卷。原來為了這個開幕禮，香港浸會大學傳播系的線成功教授特別為我們設計這個紀念品，不單如此，他還真的造了一個 3 呎高的講台，當天的開幕典禮的發言者一直就是使用這個講台。線教授也用 PowerPoint 解釋他的設計意念，當與會者知道他們每個人都可以把那紀念品帶回家時，都感到欣喜呢。線教授一直對中心的開幕典禮的籌備提供很多協助，我們也要衷心多謝他。他／她們兩位的設計和解釋都給人現代化的感覺，這也標誌著基督宗教研究雖然涉及很多歷史悠久的概念，但我們也很重視用現代化的方式去表達出來。

羅秉祥教授（香港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是

中心的主任，他也為大家清楚解釋中心的工作與使命（詳細內容可參考上一期通訊）。接著有四個學術機構當場給中心致送禮物：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中山大學哲學系、輔仁大學宗教學系和清華大學哲學系。最後，各位主禮人——吳校長、章教授、楊教授、羅主任、江副主任——及兩位香港浸會大學副校長莫民雄博士，曾憲博教授及黎翠珍院長，一起主持剪綵儀式，經過個多小時後，開幕典禮也順利完成，之後各嘉賓一起合照及用茶點，交談甚歡。

總結來說，當天的典禮的氣氛是熱烈而輕鬆的，然而我們接受的祝賀，無論在重量上（如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贈送的 70 本書）和情意上（如十四份賀詞[見本通訊第 24 頁起]、嘉賓的祝願等），都給我們沉甸甸的感覺，也叫我們感到從事基督宗教研究的學者，實在是一個群體，應該互相鼓勵和幫助。我們再次多謝與會者和各嘉賓的參與和祝賀，這些會成為鞭策我們不斷努力的力量，希望我們不負大家所託。然而中心只是剛剛成立，還是一個「嬰孩」，還是需要各方賢達繼續支持的。



左：曾憲博教授 中：吳清輝校長 右：章開沅教授



線成功教授及所設計之講台





記《基督宗教研究與大學》 學術會議

關啟文

在 2001 年 12 月 19-21 日，中華基督宗教研究中心在香港浸會大學的逸夫行政樓五樓會議廳舉行了一個學術會議，主題是《基督宗教研究與大學》，為何中心要選這主題呢？因為基督宗教研究近年在中港台都發展甚速，也朝著很多不同方向走，但反思性的討論和心得的交流不算很多，再加上以推廣「基督宗教研究」為目標的本中心剛剛成立，我們感到實在是好的時機，把基督宗教研究的反省提昇到學術層次和元層次(meta-level)。選這作學術會議的主題，也可促進學者面對面的交流，和建立一種群體的感覺。

這一次有近 30 位來自兩岸三地及海外的學者發表學術論文，他們圍繞著主題的不同方面展開廣泛的討論，例如「基督宗教研究的本質和獨特性」、「基督宗教研究與西方學術傳統和大學」、「基督宗教研究在近代中國大學」、「基督宗教與人文精神和大學理念」、「基督宗教研究的不同進路」等。顯然會議中曾討論的內容相當豐富和多元化，當然不能在短短幾頁內報導，我在這裡只是從一個有限的角度介紹一小部份會議所引發的重要課題及反省，很多未提及的論文都是同等重要的。

中心主任羅秉祥教授在會議之初就提出一個關鍵問題，就是在大學中的基督宗教研究和獨立神學院的神學究竟應有甚麼異同呢？他認為兩者的重點的確

是應該有分別的，很簡單來說，大學中的基督宗教研究不能像獨立神學院的神學那樣，可以純粹把信仰認信作起點，而是要能兼顧局內和局外人的視野，應是較「客觀」的。然而他也認為兩種學術應像身上的不同肢體那樣互相配合和互補不足。此外，他也強調在公立大學作宗教研究的學者，信徒和非信徒都是可以勝任的。(羅教授在後面第 21-22 頁有更詳細的介紹。)這種觀點是有包容性的，不少學者對此相當欣賞，認為可調和不同性質的基督宗教研究。

在會議的第一天，江丕盛教授、曾慶豹教授(台灣中原大學)和關啟文教授的文章都較強調「基督宗教學術」的獨特性，他們認為本著信仰立場作的學術研究也有其合法性和學術性。這不是排斥性的觀點，與羅秉祥教授的看法沒有衝突，然而卻引起了一些大陸學者的回應，他們認為不應過份強調基督宗教研究的獨特點，而應強調它的普遍性和客觀性。在後來的交談中，可看到兩種重點的分歧可能源自不同的處境，有不同答案也不足為奇，重要的是多溝通多對話，這有助互相了解和合作。再者，其實兩種觀點並不一定有矛盾，提倡基督宗教研究的獨特性者也同時強調這也是客觀的，他們不是要否定基督宗教研究的客觀性，而是對客觀性的理解不盡相同而已。

在會議開始時論文的理論性較強，除了上面提到的討論之外，還有何光滬教授(人民大學)和賴品超教授(香港中文大學)論到紐曼的大學理念等。可能因此胡國楨神父(台灣輔仁大學)便多次提出宗教研究的進路問題。他對第一天較理論性的進路不太滿意，而特別欣賞陳慎慶教授(香港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的社會學進路。胡神父與其他與會者交流後，大家也開始明白雙方的重點也反映處境和傳統的不同。我們的確重視系統性地探討宗教(特別是基督宗教)





的神學、哲學和倫理思想，認為這不單重要，也對現代社會有適切性。然而我們也接納社會科學的宗教研究進路，並欣賞輔仁大學這方面的傳統和成就。以上的爭論再次帶出在宗教研究的領域中，多元進路的重要性，誰也不應排斥誰。其實細心看一下，不難發現這次會議也是容讓多元進路的，例如分別以社會學進路 and 社會倫理角度討論基督宗教研究的，還有楊鳳崗教授（美國南緬因州大學）和包利民教授（浙江大學）。

第二、三天的會議以歷史的進路為重點，趙敦華教授（北京大學）、彭小瑜教授（北京大學）、尤西林教授（陝西師範大學）和章雪富教授（浙江大學）都指出在西方歷史中，基督宗教和大學的理念和人文精神有千絲萬縷的關係。章開沅教授（華中師範大學）、徐以驊教授（復旦大學）、王曉朝教授（清華大學）和李金強教授（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的研究，都顯示基督宗教高等教育已在中國有深遠的傳統，並且在今天仍在發揮影響力（香港浸會大學本身就是例子）。而陳建明教授（四川大學）、張憲教授（中山大學）和張慶熊教授（復旦大學）討論到基督宗教研究在大陸的發展，楊慧林教授（人民大學）則介紹當代中國大學生對基督宗教的理解，這些討論都很有趣，顯示關於基督宗教的研究和教學在中國的大學裡還有相當大的空間，當然也如一些與會者指出，每處地方的情況不盡相同，可能這段時間這裡熱一點，那裡則已沒那麼熱，再過一會另一處地方開始熱起來… 然而大家都對兩位張教授關於他們如何在大學教授基督宗教的介

紹印象深刻，他們都熱誠地透過基督宗教信仰的思索激發大學生的人文關懷，這種發展已是難能可貴的，起碼在十年前實在難以想像。

林治平教授（台灣中原大學）是在第三天的下午發表，我們想像在最後的階段大家都應已疲態畢露，然而林教授的論文一時之間卻使討論出現火花。他認為作基督宗教研究的學者應同時能「進得去」（與基督宗教信仰的角度認同）和「出得來」（把自己與基督宗教信仰抽離、作客觀的研究），若缺少了前者那我們只是在談論基督宗教（about Christianity），而忽略了基督宗教本身（is Christianity）。他的觀點引起熱烈爭辯，有時人擔心他過份強調「進得去」而抹煞了客觀研究的重要性。他的同事則解釋林教授的文章也要在他們的處境中理解，因為台灣政府甚至不讓他們掛上「基督宗教」的招牌，好像這方面的研究不夠學術，所以林教授只是重申，從信仰的角度（無論是完全獻身或同情地代入）研究基督宗教也是合法和重要的。

以上簡介只是三天會議一個剪影，但我們不難從中看到基督宗教研究的豐富和多元性，多數與會者都感到會議的討論很有啟發性，我們不用要求在任何問題上我們要有完全的共識，特別因為我們的背景和處境都不盡相同。大家和而不同，互相對話，攜手並進，不也是美事了嗎？



當代科學與宗教的對話特輯

對話是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也是當代學術界的大趨勢。在宗教研究的領域中，如宗教對話的重要性就是無可置疑的。

中華基督宗教研究中心對「對話」的概念則更加廣闊，我們希望推動各種學科之間的科際對話 (interdisciplinary dialogue)，如：

- 神學與哲學的對話
- 宗教與政治學的對話等

近年特別發展迅速的科際對話包括科學與宗教的對話 (science-religion dialogue)，這也是中心的重點研究項目之一。

為了介紹這方面的新發展，並配合我們近期的活動(4月4日 Ian Barbour 的講座和5月7日 Francis Ayala 的講座，詳情見第 22 頁)，這期通訊會有幾篇相關的文章。

科學與宗教的對話的當代發展

關啟文

不少人認為科學與宗教勢成水火，兩者是天生的敵人，根本沒有甚麼好對話的了。另一些人認為兩者不可偏廢，但卻將兩者各自放在密不透風的間隔裡，秉承河水不犯井水、井水不犯河水的分離政策，這樣子科學與宗教雖能共存，但也沒多大對話的空間。以上兩種看法在五十年前的學術界大概是主流吧，然而情況近年有相當急劇的變化。「科學與宗教的對話」作為一種科際研究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在這幾十年有迅速的發展，特別在 80 年代之後。它也被主流學術界肯定和加

以重視，現在關注這方面的學術期刊(如 *Zygon*)、研究中心、大學專任教席和專家學者已有不少，且有不斷增加的趨勢。(參後面江丕盛教授的文章) 神學家、哲學家和科學家都不時走在一起，深入地交流，他們都感到這種對話是叫人興奮和有建設性的。傳統的觀點認為「科學是理性的典範，宗教基本上是非理性的。」他們不再輕易接受這種講法，反而認為在對話中，科學和宗教都可從對方學習到一些東西。為何會有這些改變呢？我在下面作簡略介紹。

科學哲學的當代發展

在過往，比較流行的科學哲學是實證主義 (positivism)，它投射出來的科學形象是客觀、邏輯、準確和不斷進步的，以科學為標準，實證主義認為形而上學和神學等不能被經驗證實或測試，所以也沒有認知意義或是非理性的。

波普(Karl Popper)的科學哲學被稱為證偽主義 (falsificationism)或批判理性主義(critical rationalism)，它對實證主義提供第一個主要的衝擊。他指出科學的觀察是已被理論滲透的(theory-laden)，也可能是錯的。科學理論並非基於觀察，它們也不能嚴格地被證實，而只是**能被證偽但還不被證偽**的猜想而已 (falsifiable but not yet falsified conjecture)。科學的合理性在於它能被證偽、能被批評。雖然波普對傳統的實證主義不大滿意，但他仍希望保留科學方法的邏輯性和普遍性。

在 50 年代後期，科學哲學有歷史主義 (historicism)的轉向，波蘭耳 (Michael Polanyi) 認為就算在科學，個人性的知識 (personal knowledge) 也是重要的，科學方法不能還原為抽象的邏輯定律或準確的規則／程序 (algorithm)，科學家的判斷是不可或缺的，理性也是在信念框架 (fiduciary framework) 中才能運作。然而真正產生科學哲學界的大地震的卻是孔恩 (Thomas Kuhn)，他用具體的科學史例子論證，科學革命中不同科學家往往信奉不同的代模 (paradigm)，它們之間是互不相通、不可共量 (incommensurable) 的，所以科學理性也是受代模／框架制約。科學的改變並非直線的進步，而是充滿斷裂的過程。

當然孔恩也受到猛烈的批評，但他的批評者 (如拉加圖 [Imre Lakatos]) 所提的解決方案也不能取得任何共識。甚至有一些學者 (如 Paul Feyerabend) 把孔恩的非實在論推到「甚麼都行」的境地。另一些沒有那麼極端，如勞丹 (Larry Laudan) 就不贊成相對主義，但他把科學的合理性理解為解決問題的能力，而不是有不斷逼近真理的特性。

總結而言，實證主義關於科學的客觀性的每一點主張都被廣泛質疑了，當然歷史主義未必全是真理，但大體來說，哲學家發覺，實證論者認為存在於科學與其他學問(包括宗教)之間的鴻溝，其實並不明顯。絕對客觀的科學方法，也可能並不存在。雖然如此，還有很多科學哲學家努力論證科學實在論 (scientific realism) 的真確 (如Newton-Smith)，但這些論證也受到嚴厲批評，實在論與非實在論的交鋒，至今還在進行、還沒有決定性結果。

基礎主義(foundationalism)的衰落和 建構論(constructivism)的興起

實證論本身建基於一種基礎主義的知識論，但近代的知識論發展卻離基礎主義愈來愈遠的，最猛烈的攻擊來自後現代主義者 (如Lyotard, Derrida, Foucault 等)，他們不單認為基礎主義在理智上站不住腳，在道德上也是危險的，因為普遍理性的二分法經常為壓逼鋪路。再者，不少分析哲學家 (如Rorty, Sellars, Quine) 對理性的批判也和後現代思想家不謀而合，這使後者的聲勢更加浩大。

有些哲學家雖然放棄了基礎主義，但他們仍試圖建立一種後基礎主義的理性觀 (post-foundationalist rationality)。另一些則乾脆否認存在一種普遍的理性，他們認為理性的標準是相對於文化的，「理性」和「客觀」等概念都是特定的社會建構出來的，例如愛丁堡學派的強知識社會學研究計劃 (如 Bloor, Barnes)，他們的影響力加上後現代主義的流行，使建構論的思想愈見普遍。

新科學哲學與神學的互動

隨著對科學方法的新理解不斷湧現，調和科學與宗教的方法也層出不窮。有些哲學家仍相信某種歸納邏輯 (inductive logic) 或印證理論 (confirmation theory) 是可以成立的，但通常這理論和傳統的歸納主義已不大相同。宗教能否被證立，很視乎這種歸納邏輯的具體特性是怎樣的。至少有一位歸納邏輯的專家 Richard Swinburne，認為把



這種邏輯應用到所有證據時，我們可證立有神論的合理性。

比較多神學家認為後實證主義的哲學更適合作為科學與宗教的橋樑，例如T. F. Torrance採用波蘭耳的思想，強調科學與宗教都是一種個人性的知識，都牽涉信心和判斷。宗教哲學家米曹 (Basil Mitchell) 認為孔恩就科學革命的討論有助我們探討宗教的合理性，他指出代模之間的衝突在很多方面都和世界觀之間的爭論很相似，科學家所倚賴的一些價值，如一致性、融貫性、簡潔性、精巧性、說明能力、孕育性等，也可用來比較不同的世界觀 (包括宗教)。若科學革命不是全然非理性的，那宗教的選擇也不一定是非理性。Nancey Murphy 則訴諸拉加圖的方法論 (參下面的書介)。另一方面，有些詮釋偏向後現代主義 (如 van Huyssteen)，認為科學和宗教同樣是受社會和歷史處境制約的，從後基礎主義的理性觀來看，科學與宗教就更接近了。

實證主義的衰微也導致對科學語言的新理解，不少科學哲學家同意模型(model)和隱喻(metaphor)是科學理論中不可還原的構成部份(Mary Hesse, Rom Harré, Richard Boyd)，這也使我們重新肯定宗教用的模型和隱喻也是有認知意義的。此外，Philip Clayton論證科學說明和宗教說明只有量的分別，沒有質之差距。(參下面的書介)這些發展都使我們重新評價科學與宗教的傳統二元對立。

新的科學發展

很多人認為每一個新的科學發展都會對宗教作出無情的打擊，如哥白尼的日心說和達爾文的進化論等等，然而當代的科學發展卻似乎與這「公式」背道而馳。牛頓力學衍生的機械世界觀好像沒有為神的工作及人的自由留下空間，然而相對論的來臨打破了這種世界觀。量子力學和當代的混沌理論則使我們開始質疑決定論。近代宇宙學另一有趣的發現，就是整個宇宙的爆炸和基本設計好像是經過精微的調校，為了生命能夠出現，這現象叫「宇宙的微調」(Fine-tuning of the Universe)或「人類原則」(Anthropic Principle)，這也

似乎有宗教性涵義，指向宇宙設計師的可能性。大爆炸理論則否定物質宇宙的永恆性，這亦和基督宗教的創造論吻合。另一方面，不少人(如Capra, Talbot, 周兆祥)認為新物理 (如量子力學) 揭示世界與心靈的內在關連，和宇宙不同部份之間的有機紐帶，所以現代科學與東方宗教的神秘主義是殊途同歸的。

科學與神學的整合

科學與神學都是多向度的事物，它們之間的對話也當然如是。近年這種對話的進展實在有賴一些能在幾種學科都有功力的學者，例如Stanley Jaki就同時是物理學家、歷史學家和哲學家，他對科學與宗教在歷史中的互動的研究，作出很大的貢獻。

另一類致力整合的是科學家——神學家，他們多從方法論和世界觀角度著手，他們比較科學與宗教的認知方法，思索科學理論與神學教義對彼此有甚麼涵義。下面的書介中就會介紹四位建構全面整合的學者。他們的結論不盡相同，Torrance傾向一種古典的大公信仰，而Arthur Peacocke和Ian Barbour則較接受進程神學，John Polkinghorne好像在中間。無論誰是誰非，如此多元化的整合的存在，就是最好的論證，說明科學與宗教並非水火不容的。

當代科學與宗教的對話： 十大好書簡介

關啟文

關於科學與宗教的對話的學術著作，在這幾十年無論在量與質上都有很大增長，我們在這裡選擇十個有份量的學者，再各找他們的一本代表作簡介其內容。這方面的佳作汗牛充棟，我們掛一漏萬（特別在歷史研究方面）是難以避免的，但相信這十本書已充以令大家對當代的討論有一概略的印象，刺激大家這方面的「胃口」吧！

<科學與宗教的對話：綜覽性和整合性的研究>

以下四位都可說是這學科的泰斗，他們都很全面地就知識論、世界觀和神學教義等不同方面作出科學與宗教／神學的整合。

1) Barbour, Ian G. 1990. *Religion in an Age of Science*. [Aberdeen Gifford Lectures, 1989-91]. London: SCM / San Francisco: Harper and Row.

Ian Barbour 本身是科學家，而且在探討科學與倫理和宗教的對話中，他多年都佔領導地位。本書和它的續篇(*Ethics in an Age of Technology*)可說是他全面整合科學、宗教與倫理之後的成果。這書分為三大部份。第一部份討論「宗教與科學的多種方法」，他分析了處理科學與宗教的關係的四大模式(衝突、獨立、對話和整合)的優點和缺點，再探索模型(model)和典範／代模(paradigm)分別在科學與宗教中有甚麼角色，然後他總結兩者之異同，而指出在今天對話的模式比衝突的模式優勝。(另請參 Barbour, Ian G. 1974. *Myth, Models and Paradigms: A Comparative Study in Science and Religion*.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第二部份的主題是「宗教與科學的理論」，是很全面的概覽，涉及量子力學、相對論與熱力學、大爆炸理論、新宇宙論、進化論等，他闡釋這些新理論帶來怎樣的世界觀，而

又可怎樣與宗教信仰調和或整合。第三部份是系統性的哲學和神學反省，他對古典有神論(classical theism)不無批判，但認為較強調神的內在性的進程神學(process theology)能與當代的科學發現融和，揭示一個使人滿意的世界觀。

2) Peacocke, Arthur R. 1993. *Theology for a Scientific Age: Being and Becoming : Natural, Divine, and Human*. Enlarged Edition. Minneapolis: Fortress.

Arthur Peacocke 是著名的英國生物化學家，多年從事科學與宗教的對話，是這學科的頂尖人物之一。這本近作可說是他的系統的詳細闡釋。在前言裡，他簡略談及他的知識論進路：在科學與神學都採納批判實在論(critical realism)。(關於他的知識論，另請參 Peacocke, Arthur R. 1984. *Intimations of Reality: Critical Realism in Science and Religion*.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然後他分別用三個部份論及自然界、上帝和人類的存有與生成(being and becoming)，力證科學與神學對世界的理解是類似和可以共融的。現代科學(特別是進化論)揭示一個不斷變化、不斷出現更高層次的新事物的世界，也指向更超越和更包容的存有——既超越又內在的上帝，這種信念不但不違反科學精神，反而是完成了科學對世界的可理解性的尋求。另一方面，科學的新發現也幫助我們重新詮釋神學，Peacocke 認為當代科學世界觀使我們更明白基督教的上帝不是抽離和遙遠的，而是一位道成肉身、受苦的上帝。

3) Polkinghorne, John. 1994. *The Faith of a Physicist: Reflections of a Bottom-up Thinker*.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John Polkinghorne 是著名的英國數學物理學家，但中年卻放低科學的事業，獻身神學和教會，成為聖公會的牧師，是近年科學與宗教的對話中最重要人物之一。他學問廣博，行文清晰，所以他的著作特別適合入門者閱讀。本書的名字是《一個物理學家的信仰》，其特點是它每一章都是圍繞尼亞信經討論，包括人性、信仰、上帝、創造、耶穌、釘十字架和復活、神的兒子、聖靈與教會、末世論等。他的目的是想探討在當代的科學世界觀中，這些古老的信條應如何理解。當很多神學家認為現代科學逼使我們放棄或徹底修正這些信條時，Polkinghorne 作為科學家卻認為這古老的信仰今天（大體而言）仍是站得住腳的（如神的存在、神蹟等），所以我們並不需要放棄以三位一體和道成肉身為中心的基督宗教。（另請參Polkinghorne, John. 1991. *Reason and Realit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ence and Theology*. London: SPCK / Philadelphia: Trinity Press International.）

4) Torrance, T. F. 1984. *Transformation and Convergence in the Frame of Knowledge: Exploration in the Interrelations of Scientific and Theological Enterprise*. Grand Rapids: Eerdmans.

T. F. Torrance 是著名的蘇格蘭神學家，他除了神學方面的功力深厚，在科學與宗教的對話上也作出巨大貢獻。本書描劃近代科學世界觀的興起，及其產生的二元論世界觀如何對神學提出挑戰。然而他認為無論是科學或神學對知識的反思，其實帶來的是兩者的趨同，而不是分歧。他對科學的理解很受著名科學家和科學哲學家 Michael Polanyi 影響（第3章），所以他強調就算是科學研究最終都有一些終極信念是不可證實的（第5章），然而科學研究也不是「甚麼都行」，而是在一些基本信念框架下進一步發現世界是可理解的。他的神學進路則主要受巴特(Karl Barth)影響，認為神學不可建基於證明（自然神學），而是啟示，然而他認為只要正確安放好啟示神學的首要地位後，某種關於自然的神學(theology of nature) 也可在其中佔一定地位，這就為科學與宗教的對話留下空間。他也認為二十世紀的

科學發展（特別是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已打破二元論的世界觀，揭示一個偶然(contingent)但統一和有理性秩序(rational order)的世界，這就與「上帝的創造」的概念不謀而合。（另請參Torrance, T. F. 1981. *Divine and Contingent Order*.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創造論與進化論之爭>

生命從何而來——進化或創造？這一直是科學與宗教的對話中爭持得最激烈的課題。在80年代的美國，科學創造論甚至與進化論者對簿公堂，雖然前者提倡在學校同樣教授創造論的努力失敗了，但不少人開始重新檢視進化論。一般而言，80年代的科學創造論並不被主流的大學學者尊重，但90年代中期興起了一個「智慧設計運動」(intelligent design movement)，以下三位都是代表人物，他們的努力卻漸漸被主流學術界重視和被傳媒注意。這也引發了新一回合的進化與創造之爭，這場辯論不單到達較高水平，也饒有趣味，很值得讀者留意。

5) Johnson, Phillip E. 1993. *Darwin on Trial*. 2nd edn. Downers Grove, Illinois: InterVarsity Press. 詹腓力著，《審判達爾文》，北京，中央編譯，1999。

智慧設計運動的先驅Phillip Johnson是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法律學教授，分析和破拆論證可說是他的專業，本書在1991年最初出版後便轟動一時。書中清晰地分析進化論者的論證，並逐一指出其謬誤，結論是單從科學證據來說，並沒有好的論證可證實進化論，所以進化論的基礎不是科學，而是哲學——自然主義世界觀。很多人堅信進化論，不是因為有證據，而是因為先接受了自然主義的世界觀，不得不摒棄創造和設計的思想，進化論順理成章便成為「真理」了。Johnson的著作流傳很廣，他又四處演講，且經常與進化論者公開辯論。他雖然是廣義的創造論者，但他的策略是避開有爭議性的創造過程問題，而集中批判進化論的證據和哲學前設。這書的第二版也有他對一些批評者的回應。

6) Behe, Michael. 1996. *Darwin's Black Box: The Biochemical Challenge to Evolu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有中譯本：邁克爾·J·貝希著，刑錫範等譯，《達爾文的黑匣子——生化理論對進化論的挑戰》，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

後期加入智慧設計運動的有分子生物學家比希(Michael Behe)，他是美國利希大學(University of Lehigh)教授，他這本《達爾文的黑盒子》叫他一炮而紅。書中提出「不可還原的複雜性」(Irreducible Complexity)的概念，意即一個由多個部分組成的系統，若缺少了任何一個部分，這系統就會失去原有的功能，那麼這系統就有不可還原的複雜性。這種系統是不能透過隨意混雜組成各部分而形成的。比希接著指出達爾文提出進化論時，生物對他來說好比是黑盒，他是完全不明白生物在分子層面的精密組織的。但今天這黑盒已打開了，科學家已了解到多種生命功能的化學機制。比希更仔細地解釋幾種複雜的生化機制(如血液凝結的機制)，以具體的例子指出這些機制有不可還原的複雜性，是不可能緩慢進化而成的。他也多年著意地在進化論的學術期刊找尋進化論者提出的解釋，但叫他意外的是，解釋這些生化機制如何演化的文章有如鳳毛麟角，而具體和合理的解釋更是付之厥如！比希並不排除生物演化的可能性，他只是指出生物的黑盒中其實有無數生化系統有不可還原的複雜性，它們是不可能從進化而成。從我們的經驗來看，智慧的設計仍是最合理的解釋。這本著作引起廣泛注意，有人讚賞，也有人猛烈攻擊(如道金斯)，但無論如何，進化論的正統地位似乎受到嚴峻和建基於科學的挑戰，而智慧設計的概念重新登上科學家的舞台。(關於 Behe 如何回應一些批評，請參 Behe, Michael J. 2001. "The Modern Intelligent Design Hypothesis: Breaking Rules." *Philosophia Christi*, Series 2 Vol.3, no.1: 165-179.)

7) Dembski, William A. 1998. *The Design Infer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然而很多科學家和哲學家仍然對智慧設計的概念深感懷疑，縱然他們同意今天的進化論問題重重，但他們始終會認為進化論原則上可算是科學，而智慧設計則不能，因為它不是科學化的推論。William Dembski就在方法論上作出有力的回應，他雖然是較年青的數學家 and 神學家，但現已在智慧設計運動中佔領導地位。他指出智慧設計是一個我們日常生活和多種科學(如 forensic science) 都採納的推論方式，如何能說它不合法呢？他從這些我們接受的推論歸納出「智慧設計推論」(design inference) 的方法論，顯示它是有嚴謹的規則的，並非好像一些人認為是可隨意濫用的。以下是較通俗的介紹：Dembski, William A. 1999. *Intelligent Design: The Bridge between Science & Theology*. Downers Grove, Illinois: InterVarsity Press. 而上面列出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智慧設計推論》則較技術性，在書中 Dembski 用嚴謹的數學理論(如或然率)和資訊理論(information theory)，力證「智慧設計」在哲學上和科學上都是可接納的。他的工作也引起很大爭論，甚或攻擊，若他的看法是對的，對智慧設計運動最常見的批評就不成立。縱使他不全對，他的思想也能激發我們深刻地反思甚麼叫科學方法，以及擴闊我們對「推論」的了解。

<當代宇宙論的發展與宗教>

8) Craig, William Lane and Quentin Smith. 1993. *Theism, Atheism, and Big Bang Cosmology*. Oxford: Clarendon.

克雷格(William Craig)是當代著名的宗教哲學家，他透過持續不懈的努力，可說單人匹馬在當代復甦了宇宙起始論證(kalam cosmological argument)，引入注目的是他結合了嚴謹的哲學分析和最新的科學證據，論證宇宙不是永恆的，從而推論出創造主的存在，因為凡有起始的事物都有因。他也能在學術期刊一一有力地回應批評，連無神論者史密夫(Quentin Smith)也承認有神論者在詮釋最新的宇宙論發展上佔了先著，故他奮起回應，他與克雷格的辯論就收集成上列書。這場爭辯的結果尚未可知，但



史密夫並沒有明顯佔上風，他主要的回應策略是說宇宙可無緣無故地爆出來，但去相信這樣偉大和精密的宇宙可從絕對虛無中爆出來，有多合理呢？有神論的解釋似乎也不可排除吧？無論如何，當代天文物理的發展的確使宗教的課題重新放在議程上。(至於探討「宇宙的微調」的佳作，則有 Leslie, John. 1989. *Universes*. London: Routledge.)

<從當代科學哲學看科學與宗教的對話>

9) Clayton, Philip. 1989. *Explanation from Physics to Theology: An Essay in Rationality and Relig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Philip Clayton在這本書探討一個與科學哲學和宗教哲學都息息相關的課題，就是「甚麼是有效的說明(explanation)？」邏輯實證論者愛指控宗教的說明都是偽說明，並不能真正幫助我們了解這個世界，因為他們相信只有能作出預測的自然科学的說明，才是貨真價實的說明。Clayton 仔細探討「說明」的概念，和自然科学、社會科學和宗教的說明的特質，指出三者的確都有相異之處，但卻不是在質上的絕對分野。三者在很多方面有不同程度的相似性，整體而言構成一種說明的連續光譜。所以絕對否定社會科學和宗教的說明能力是不對的，用這方法攻擊宗教的合理性也不見很成功。(另參Clayton, Philip. 1997. *God and Contemporary Science*.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0) Murphy, Nancey. 1990. *Theology in the Age of Scientific Reasoning*.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當代科學哲學有很多有趣的發展，波普(Karl Popper)對實證主義帶來第一波的衝擊，而孔恩關於代模(paradigm)的理論更把科學哲學帶進歷史主義(historicism)的領域。然而另一位著名科學哲學家拉加圖(Imre Lakatos)指控孔恩將科學哲學變成「暴民心理學」，他提出另一種甚有影響力的科學方法論。他指出理性評論的單位實是一個科學研究計劃

(research programme)，即是一整串不停發展及不斷修正的理論。至於應接受哪一個研究計劃，判決是要看長期表現。若研究計劃在修正過程中預測到新事物即是前進(progressive)的，它就可被接受；若它只是在不斷修正而全沒有預測力，即是退化(degenerating)的，它就不應被接受。Nancey Murphy 是著名的神學家，她在科學與宗教的對話中，是少見的女性學者。她應用拉加圖的方法論在神學上，認為某些神學研究計劃也能符合拉加圖的標準，是前進而不是退化的。無論她的結論是否完全成立，但她的努力使我們更明白，若採納一些較複雜的科學方法論而不是簡化的，我們會清楚看到科學與宗教有不少相似之處。(從科學哲學新發展入手的，還可參考 Van Huyssteen, J. Wentzel. 1989. *Theology and the Justification of Faith: Constructing Theories in Systematic Theology*. Grand Rapids: Eerdmans.)

<其他方面>

從歷史角度研究科學與宗教的關係也是重點的學術研究方向，近年也有不少新的成果。這方面的書也很多，我推薦以下三本：

Brooke, John Hedley. 1991. *Science and Religion: Some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約翰H.布魯克著，《科學與宗教》，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

Hooykaas, R. 1973. *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Modern Science*. Edinburgh: Scottish Academic Press. [有中譯本：霍伊卡(R. Hooykaas)，《宗教與現代科學的興起》，錢福庭、丘仲輝、許列民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

Jaki, Stanley L. 1978. *The Road of Science and the Ways to God*. [Edinburgh Gifford Lectures, 1974-76].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Edinburgh: Scottish Academic Press.